

何以拯救“枪火下的美国儿童”

国际锐评

“父母们每天醒来都是在祈祷，他们的孩子没有遇上枪击案，孩子所在的学校也没有发生枪击案。”美国一位议员这样描述枪击暴力给美国人造成的巨大心理阴影。

根据美国非营利组织“K-12学校枪击数据库”最新数据，眼下距离年底还有两个多月，但美国今年以来已经发生了260起校园枪击事件，创下单年校园枪击案数量新高。仅仅在最近几天就发生多起枪击案，特别是

24日发生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一所高中的枪击案，造成包括嫌犯在内的3人死亡、7人受伤。

据美国媒体报道，这起枪击案的行凶者是一名19岁年轻人，他当天上午进入高中实施枪击。而案发前学校大门都已关闭且有保安值守。校长在得知信息后立刻按照演练程序通过扩音器向全校发出代码，暗示校内有枪手。然而不久后，惨剧还是发生了。也就是说，即便美国的教师和学生已做好随时应对枪击的训练准备，也无法阻止案件的

发生。这对美国民众心理造成了更大的冲击。

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0月27日，全美今年已有1379名儿童和青少年死于枪击，另有3687人受伤。而据一本名为《枪火下的儿童》书籍作者预计，高达数百万美国年轻人受到枪支暴力案件的影响。

在美国，枪支暴力对年轻人心理健康的伤害超出想象。当前，美国青少年患焦虑症、抑郁比例不断上升，一些学生对枪支暴力的关注与

担忧远超学业。在今年5月得克萨斯州罗布小学发生大规模枪击案后，一本名为《书不怕……我准备好了》的书一度卖断货。随着新赛季开启，关于应对校园枪击事件、儿童精神创伤等问题的儿童读物需求量不断增加。

面对美国层出不穷的枪击案，很多人都在疑惑：美国政府在战场上经常为一个士兵死亡而大肆报复，宣扬所谓“人命贵”，为何面对一个个美国儿童、青少年倒在枪下却无动于衷，变成了“人命贱”？

实际上，这要从美国政治制度缺陷谈起。当前美国失控的枪支暴力之所以难解决，既是因为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关于持枪权的规定难以撼动，也与美国两党的“否决政治”有关，同时像美国全国步枪协会这样的利益集团游说运作也起了重要作用。多重阻力之下，即便今年6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一项“两党爱协版”控枪法案，也起不了作用。几个月来，美国多地此起彼伏的枪声、喋血枪下的无辜民众，无不证明了这点。

不是没有路，而是不迈大步。对美国政客而言，解决枪支暴力必须有为民众服务的强烈决心，回归反映民众需求并制定理性政策的初衷。但是他们整天埋头政治精算，只有讲话没有行动，顶多是“修修补补”。

如果美国政治制度缺陷得不到弥补，如果美国政坛一直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掌控，如果一手卖枪一手卖防弹衣的利益集团始终如鱼得水，美国民众就难逃枪支暴力的阴影，不得不用生命为之埋单。

度

夜笔悟者

处世之道，就在于讲究一个“度”字，它不仅渗透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更在于个人的修养。说话做事也好，学习享乐也罢，如果不能做到进退有度，取舍有度，就很可能陷入物极必反的桎梏之境。

什么是度？度就是有分寸，度就是有底线，度就是别过火。心中有尺，口中才有度；人有谦卑，斟酌再出言。人人都有不足，如同有缺口的杯子，只要你从不从口处去看，杯子就是完整的。

有些人觉得，做人要真，所以说话要直。其实不然。我们写“真”字，是“直”下面两点。也就是说，一些实话、直话，也要保留两点。实话实说是真，但实话实说就是蠢。“君子不失信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了解别人，你是智慧；了解自己，这是高明。当你渐渐克制，朴素，不怨不问不记，就能体会生命盛大。

做人要有度，太直伤己，太假伤人。太善被欺，太恶遭恨。做事要有度，太拼伤身体，太懒难成事，太慌易出错，太慢没效率。待人要有度，太热情，被人怀疑，太冷淡，让人寒心。太信任，失望会大，太防备，会有距离。渡人如渡己，渡己也是渡人。

遇事，一张一弛，轻重缓急分寸要拿

捏的合适。光说了别人对错，原来自己也不完美；只道别人长短，原来自己也有缺陷；尽看别人是非，原来自己也不是圣人。心中有尺，说话做事衡量再三，不要人前给人难堪。遇事退一步，做事容一度，吃些亏也没什么，得到的是他人尊重，换来的是自己安心。

胸怀要大度，“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说的就是做人要有有度量，心胸要宽广。山不言自高，水不言自深。凡事不必斤斤计较，往后一步，海阔天空。不要过分计较个人得失，大度的对待伤害过你的人或事吧。

口中有度，知道什么话可以说，知道什么事不能做。损人不利己，伤人是伤己，当你怀善心对别人，在你需要的时候，总有人帮你。我们选择不了命运，但我们可以选择走过生命的方式。做人选择宽容厚德，几分淡泊，清风细雨，同样有韵味，有诗意，做事要有几分从容，俯仰之间，依然洒脱。

凡事如果以私心，做过了，必然会走向反面，得到不好的结果。古人推崇“中庸”之道，以利他之心待人待物，不偏不倚，就可做到恰到好处。若善于将此信念时时运用到生活中，便无往而不利。

人生短暂，不能太缺，不能太满，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凡事当有度，心态要知足，才能进退自如，轻松舒服！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帮人就是帮己，渡人就是渡己，与自己为善，就是与己为善，成就他人，就是成就自己！

这就是我理解的《度》。

深思！警惕！

万隆：郭学聪

不知从哪一个阴暗的角落传来了极其毒辣的传闻——近来中国科技、经济的突飞猛进全是偷来的。我们侨居于印尼的华裔，绝大多数脑子还是清醒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我们为之气愤填膺，因为我们的祖祖辈辈在此长期的风风雨雨的经历中感受过我们祖国——中国的关怀、支持，已深深感到它是我们最有力的靠山！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国家为了自己无耻的目的欲盖弥彰，胡作非为！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世上最团结友爱，最善良勤劳的民族；历史的见证，他们不甘当亡国奴，也决不会去当仰人

鼻息，听命于人的哈巴狗。

听吧！神舟飞船已胜利完成最新出的航天历史，高铁新的创新层出不穷，快速普及四面八方，一桩桩科技新生物像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事实胜于雄辩，手机新款式——尤其过不久将面世的北斗手机，无论何处恶劣的环境下都能接收到信息，高科技产物或经济产品都是中国人民的智慧与汗水的结晶。

总而言之，有些人也许是不明真相，而人云亦云，但不可原谅的是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达到其垄断市场、侵占他国的野心，为掩人耳目而发出一连串的谬论，这种企图终将原形毕露并碰得头破血流，粉身碎骨！（作者单位：万隆融华华文学习中心）

今年“万圣节” 韩国千家泪

廖省：林越

近一个世纪来，西风东渐，如今不少亚洲国家的年轻一辈已开始倾向于过“洋节”；在流行文化和群体活动的推动助澜之下，除了圣诞节、感恩节及情人节外，万圣节(Halloween)也成为广受欢迎的大节日，成为远离了宗教内涵，单纯的“狂欢节”。

根据资料，公元前居住在爱尔兰、苏格兰的凯尔特(Celtic)人，把10月31日定为人死后能获得再生希望的日子，称之为“万圣夜”。大家熄掉炉火、烛光，让幽魂无法找到活人，还把自己装扮成妖魔一样，家里摆放雕成鬼首的南瓜，向小孩派发糖果或礼品。

多家国际媒体报道，10月29日周末晚，韩国首尔龙山(Yongsan)区梨泰院(Itaewon)洞因万圣节活动大规模人员聚集，引发踩踏事故。截至30日，事故已造成154人死亡、80人受伤，其中16人重伤。伤亡者多数为20多岁的女性，有14国的26名外国公民遇难。这次事故是自2014年“世越号”客轮沉没事件后，在韩国发生的伤亡人数最多的事故。

韩国上下哀声一片。各国领导人纷纷致电慰问：“向遇难者家属以及韩国国民致以最深切的哀悼，祝伤者早日康复。”“这是一场悲剧”“我们的心与所有韩国人在一起。”

据警方陈述，当晚22时许，消防部接到报警，在梨泰院站附近一条小巷里有人群被困，需要紧急施救。消防员赶到相关地点，无奈群众太过密集，阻碍了通道和时间；到达现场后发现伤者堆叠了好几层，有数十人已处于心脏骤停的状态，立即在现场进行救援。

目击者描述，约有10万人在梨泰院参加节日聚会。踩踏事件发生在汉密尔顿(Hamilton)酒店旁狭窄下坡的4米宽

小巷，因地处江北的南山，该区多是陡坡而狭窄的道路。事发前的视频、照片已看到蚂蚁般的人群。而梨泰院地铁站1号及2号出口偏偏又在附近。

现场人山人海、摩肩接踵。人群中有传言称一位著名流行歌手出现在附近酒吧，许多追星的年轻人为了“一睹明星风采”纷纷挤进小巷；随即遇上从酒店、地铁拥来的人流，导致了踩踏发生。湿滑的坡路有人跌倒，后方紧跟的人流像骨牌倒下，造成严重挤压。从视频上看，摔倒叠起来的民众超过10层。前来救援的人员都难于把堆积的伤者救出来！

韩国消防厅称，为了处理事故，共派出500多名消防员和1100多名警察。除了首尔本地的救护车外，还从周边地区调派了数十台救护车、消防车赶往现场救援。首尔多家医院的医护人员也前赴现场救助，并在事故现场附近搭建了临时急救所，对伤者进行救治。

众所周知，所有大型活动、节日狂欢、人潮汹涌的现场，一旦发生踩踏事故就是灾难性的后果。踩踏的发生往往是没有理由的，几个人的异动会快速传播到所有人。当拥挤移动时，有人意外跌倒，后面的人群依然前行，把跌倒的人踩踏，从而加剧拥挤和跌倒的人数。

截止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但有议论认为，警方在维安布局方面不够谨慎，现场人员准备不足。加上有外国驻韩使馆在给其国民的旅游警示中写道：“不盲目跟风参加大型群体性活动，警惕陌生‘糖果’及‘饮料’。”让社交媒体上关于“有些人吸毒，与别人发生冲突造成现场混乱”的传言得到旁证，更容易被受害者家属所相信。

对韩国而言，之前疫情防控比较紧张，三年来没有大型庆祝集会。如今防疫压力突然

释放，允许“万圣节”活动，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自然特别强。27日，龙山区召开了“万圣节应急措施会议”，并发布消息称将对新冠疫情进行设施消毒和隔离，但忽视了最主要的隐患，没有为大量人群聚集准备安全管理措施。韩国MBC电视台30日报道，事实上从28日晚间开始，就有成千上万人在梨泰院聚集，引发人们对发生意外的担忧。

《韩国日报》称，韩国各级政府对事故的应对偏离重点。去年虽然制定了庆典集会的安全手册，但只是针对有主办方的活动。如果像此次“万圣节”没有主办方的活动，管理手册无异于一纸空文。“惨祸发生前一天就有征兆，但有相关部门并没有采取相应措施。”

南韩总统尹锡悦随即下察，但见踩踏事故现场一片狼藉。他神色凝重地说，将把施政重点放在开展事故善后处理和采取后续措施上，彻查事故原因，争取不再发生类似事故，指示有关部门对各地集会活动实施紧急检查。政府指定30日到11月5日为全国哀悼期。

悲剧发生时的视频不断涌现，现场一些人的行为引发社会的愤怒。韩国《朝鲜日报》30日报道，网上显示，医护人员在事故现场为昏迷者进行心肺复苏时，数十人还在周围跳舞。一辆响着警报器的救护车停在马路上，希望人员和车辆回避，但却被不少人无视。网民愤怒留言：“这些人已经失去人性，”“为灾难现场的救护车让路不是应该的吗？”

看着新闻屏幕，我不禁低声长叹，想起了祖辈的训诲：“人多不去凑热闹。”现代年轻人已忘却古朴的东方哲理，随着“民主自由”“新潮思想”的时代洪流，被西方的“毒糖果”所迷幻，“追星文化”所误导……呜呼！西方“万圣夜”，韩国千家泪。



王福涵——全能的历史学家(1)

安迪·阿赫迪安(ANDI ACHDIAN)

年。

农村人的历史
即便没有完整的思想体系，我们也没有理由否定王福涵对印尼史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我们将从1962年3月开始说起，两年之后他完成了印尼大学文学院历史专业大专论文。在给丹尼尔·列夫(Daniel Lev)的信中，王福涵描述了他在爪哇农村旅行所见所闻的深刻印象。“关于农村人的现代历史，有许多值得探讨的有趣之处……”“至今，现有历史描写的对象主要都是精英，有政治家、民族领袖、外交家及其他”(王福涵于1962年3月写给丹尼尔·列夫的信)。列夫(Lev)的回复支持了王福涵的看法。丹尼尔·列夫写道：“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上流社会和农村人之间的距离似乎相差太远了，现在的上流社会对农村人的生活所知甚少。”(丹尼尔·列夫于1962年5月

26日写给王福涵的信)。
这里我们感觉到王福涵正走进印尼现代历史撰写丛林中的一块无主之地。实际上，他并不孤单。同一时期，沙托诺·卡多迪佐(Sartono-Kartodirdjo)正在撰写以万丹(Banten)农民起义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沙托诺(Sartono)的博士论文，题目是《1888年万丹农民起义的条件、过程和结果：印尼社会运动的个案研究》(The Peasants' Revolt of Banten in 1888, Its Conditions, Course and Sequel: A Cas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in Indonesia)清晰地将农民置于历史主角的位置之上。在他看来，这种做法与当时印尼史学以荷兰为本位(Neerlandosentris)的历史视角截然不同。不过，在阿姆斯特丹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沙托诺于1966年才完成了他的作品。
王福涵用了两年的时间才将他的观点以书面形式淋

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在那个时期，他阅读了法国学者保罗·穆思(Paul Mus)的《越南：战争社会学》(Vietnam: Sociologie d'une guerre)(1952)(关于保罗·穆思，请查阅Chandler, 1999:149-191)。王福涵认为，这本使用17世纪法国短文体撰写的作品晦涩难懂。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帮助下，他对保罗·穆思的思想有了粗略了解。保罗·穆思强调农村是东亚国家的心脏(与西欧经验中的城市相比)，且具有自治性质。后来，在耶鲁大学留学期间，他听了保罗·穆思的许多课程。(Onghokham, 2002: xxii-xxiii)
王福涵获得了吸引人的研究资料，那是雅士贝勒斯州长(Residen Jaspers)有关中爪哇北岸，如南望(Rembang)、布罗拉(Blora)和巴蒂(Pati)一带的萨民运动(Gerakan Samin)的秘密文件。这份资料是他从前任巴蒂县县长(Bu-

pati Pati)获得的。有了这份文件，他的资料可以说齐全了。他也完成了题为《萨敏主义：20世纪初农民运动时期的文化和经济社会研究》(Samimisme: Tinjauan Sosial-Ekonomi dan Kebudayaan pada Gerakan Tanidari Awal Abad ke-20)的学士(Sarjana Muda)毕业论文。他发现到，拥有土地的农民，而非农民雇佣工或没有土地的农民，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农民运动的主角。此外，还存在“殖民赋税”的问题。他认为，这是起义的主要原因(请查阅Onghokham, 1964)，而不是由沙托诺·卡多迪佐提出的殖民地居民对“公正女王(Ratu Adil)或千禧年传说(Mileniarisme)”的信仰导致的。
我们发现，王福涵完成了耶鲁大学学业之后，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已经非常成熟了。不过，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王福涵从就读印尼大学历史系开始的学术发展之路。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

